

中国共产党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 李佳金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时代新人”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历史条件形成的表述。百年来,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时代新人,党在培养时代新人的实践中,始终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能够根据时代需要不断调整培养的总目标,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培养方式。中国共产党培养时代新人的百年历程,深刻揭示了青年培育的内在规律,为我们今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了重要启示:要从党史的角度理解“时代新人”概念的历史穿透力;要牢固树立青年的理想信念,将政治标准作为培养时代新人的首要标准;要准确认识青年发展规律,根据时代需求调整青年培养的思路;要深刻把握当代青年的代际特征,保障党的事业的代际传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时代新人 青年工作 历史经验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4.003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担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代际传承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年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时代新人”。在培养时代新人的主题下,习近平总书记就“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作出重要论述,分别对应了青年培养的核心标准、总体目标以及培养方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时代新人是新时代的特有表述,是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时代需要基础上生成的概念。总结中国共产党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经验,对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始终牢固把握青年培养的政治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的百年历程中,具备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对党忠诚等政治标准始终是居于首要地位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标准的具体表述不断变化,科学内涵不断丰富。

收稿日期:2021-07-02

作者简介:李佳金,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重大培育项目“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多元教学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编号:2020ZDJG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青年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主要力量之一。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就号召“新青年”起来改造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吸引青年加入革命阵营。1927年中共五大《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提到,“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到“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任卓宣等脱离革命队伍,党开始认识到:知识青年的思想动荡不定,并非所有青年都是“革命青年”,不仅要关注如何号召、吸引青年加入革命阵营,还要进行专门的培养。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有一部分讨论“红军党内青年组织”问题,强调关注青年群体“不同的情绪”,要使党内青年“特受一种青年教育”、在思想上入党等,还做出在党内成立青年工作会议的决定。这一时期党开始高度关注青年的思想教育问题。

中国共产党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国统区大量知识青年也投奔延安,但一部分青年脱离革命实践和工农群众,还不具备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勉励青年人,要能“吃小米饭、爬清凉山”,革命“到老到死,都不动摇,不退缩”,勉励青年要有“永久奋斗”的决心^[1]。自此开始,政治立场成为中国共产党青年培养的重要标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青年的政治标准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变化,毛泽东将其进一步归纳为“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培养的目标变为“又红又专”,其中作为政治标准的“红”是处于第一位的,也就是坚定理想信念,这与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永久奋斗”标准一脉相承。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2]在毛泽东看来,“红”与“专”两个标准是有先后之分的,政治标准要优先于业务标准。因此,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青年的标准是同时强调“红”与“专”,但“红”显然居于优先地位。随后,全国高等院校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严格把握思想政治关,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上站得稳、业务能力强的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政治标准的要求体现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对青年的思想造成剧烈冲击。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过程中,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渐意识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绝对不能放松。1985年,邓小平指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之后,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两手抓”思想:既要抓经济、改革开放,也要抓思想、理想信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此后,党的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都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对青年理想信念问题的高度关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时

期,同时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征程中,青年人的角色至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提出了时代新人的政治标准,强调青年要有理想信念,即“精神上的钙”。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青年理想的内容:在革命战争年代青年追求的理想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则追求“艰苦创业”“建设祖国”,而改革开放时期又进一步演化为“锐意创新”“振兴中华”^[4]。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百年党史经验出发,更是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角度出发,论述理想信念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要有理想,否则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青年,必须首先讲政治,树立牢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明确“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关于青年理想信念的具体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中既包括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强调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还涵盖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气象”。从总体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期望,不仅是对党强调政治标准的继承,同时还立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五千年演进历程的历史高度,赋予时代新人政治标准以当代内涵,是对党的百年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总结中国共产党探索“为谁培养人”的百年历程,会发现党对政治标准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述会随着时代背景而发生变化,例如,在延安时期提出的“永远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出的“又红又专”、改革开放后强调青年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百年探索历程,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提出青年要有“精神上的钙”,要明确“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历史上青年培养的政治标准。

二、根据时代需要不断更新总体培养目标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培育青年的百年历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的主要任务不同,对青年的培养目标也在不断调整。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培养青年的总体目标根据时代需求不断丰富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培养革命青年的步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打破旧文化、旧道德的宣传活动,主张在青年人、特别是农村青年中打破封建礼教观念,启发青年的革命思想。例如,1931年9月,湘鄂赣苏区通过“文化问题决议案”,提出“苏维埃区域内,要把旧社会里所流传下来的一切宗教风俗教育以及旧礼教等,彻底铲除”,“根本肃清旧社会里所遗传下来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守贞守节等旧礼教,旧道德观念”,进行“严守实践”“参加会议踊跃发表意见,但已决议则绝对遵守”^[5]。同时,中国共产党努力恢复大革命失败后被破坏的各地共青团组织,积极保存学生会等青年组织,确保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革命行动,为培养具有革命精神、对党忠诚的“革命青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长征结束进入延安后,面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北严酷的自然环境等不利条件,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建设好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的期望内容有所丰富:不仅希望青年能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良好的个人道德水准,同时也希望青年能够学习专业知识,提高理论水平,为根据地的建设作出贡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党非常重

视青年能力的培养,继承并发展了民国教育的通才教育理念,提出了“智德体美群”标准,又称“五育”原则。1939年,延安召开模范青年大会,时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冯文彬在讲话中提出,中国青年应该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方面提升综合素质,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还非常重视青年的理论学习。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发起了学习运动。1940年1月3日,中央下达《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提出全党都应该“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轰轰烈烈的延安学习运动就此展开。当时作为学员的宋平后来回忆,“这些基本知识的学习,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6]1940年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等院校纷纷成立,致力于培养服务于革命的专业知识人才,其中自然科学学院更是提出了“革命通人,业务专家”的口号。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确立了既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又有业务能力的青年培养目标,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德才兼备”。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培养什么样的人”,提出了包括“又红又专”“德智体”以及“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等青年培养目标。1957年之后,毛泽东对高等教育和青年培养目标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青年培养的“德智体”标准。同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目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综合考量“又红又专”“德智体”以及“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等概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培养目标,既强调青年的理想信念要坚定等政治标准,又强调培养青年的才能,而且政治标准是培养青年的首要标准。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专业人才、特别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结构人才的需求非常突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青年培养目标进行了新的论述。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专并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7]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西方思潮陆续涌入我国,对青年的理想信念造成冲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青年培养的政治标准,并形成了一个新概念:“四有新人”。1986年11月,邓小平在《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中强调:“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8]这一变化过程是改革开放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独特历史现象,“四有新人”标准是改革开放后党对于青年时代期望的集中体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挑战,对青年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国内外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涌现,对当代青年的理想信念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当代国际竞争对于尖端科技人才的需要越来越紧迫。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急需一批既有高度理想信念、又有高度专业技术水准的青年推动中国的发展。因此,今天的青年面临的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青年培养的德才标准已经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了,而是“二者并重”的问题,只有二者并重发展,才能应对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培养什么样的人”问题的百年探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培养

目标的问题上牢牢抓住了政治标准、才能标准及其关系。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从强调以德为先到德才并重,形成了基本的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进入新时代,青年成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做到德才并举、二者并重,才能培养青年成为合格的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继承人。

三、采取与时俱进的培养方式

如何培养人,关系到青年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始终根据时代发展要求,采取与时俱进的青年培养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开始大规模兴办高等教育,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等院校,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但对于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明晰的,而是有一个从争论走向明确的过程。争论的问题核心是:高等教育要以教授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为主,还是以结合革命生产实践为主。以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为例,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成立后,学院内部关于如何育人产生了不同意见。一些老师认为,培养青年应该注重基础理论,提出“基本科学是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基础,是必要的开步走的理论知识”^[9];另一些老师认为,纯粹理论教育是脱离革命生产实践的,不能让学生“夹着书本,在工厂、农场的大门外彷徨着”^[10]。在严峻的抗日战争形势和延安紧迫的内外环境下,从理论和专业基础出发的教育方式难以满足紧迫的革命战争要求。因此,1942年前后自然科学学院进行了科系调整,确立了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建立了机械实习工厂、玻璃厂、化学厂、实验农场等,既服务教学研究,又同时满足革命生产,还提出了一个育人口号:“革命通人,业务专家”,让青年在服务工农群众、服务革命生产的过程中学习知识。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需求已经不同于延安时期,因此,青年人才的培养方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自1951年开始,新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学习苏联模式,向培养正规化、专业化、符合国家建设需要的各项专业技术人才转轨。为此,我国高校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学习苏联经验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进行了院系调整,建立了以专业培养为中心的教学制度,还引入了“习明纳尔”等教学方式,在当时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从1957年开始,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再加之苏联这种学科体系复杂、专业门类众多、理论门槛高,被批判为“将普通工农青年拒之于高等教育大门之外”^[11]的教育模式。从此中国高等教育和青年培养方式开始主张青年在服务工农兵、服务革命生产的过程中学习知识。但历史证明,脱离理论专业知识、纯粹搞实践教育也是不正确的。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在“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育人目标更加强调现代化、专业化素养,更加注重正规化、现代化的育人方式。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的才能主要指会打仗、会收发电报、会识字写信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是青年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广阔的学科视野、精熟的专业水准以及开放的学习能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提出了“教育现代化”口号。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全新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青年培

育目标和培养方式的现代化,是当时中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契机、迎接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客观要求。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的世界格局与半个世纪前已经大为不同。近年来全球竞争,包括中美之间的摩擦,已经成为包含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等一系列历史合力长期作用的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培育过程中,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时代新人的“文化基因”。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2]。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中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他勉励青年要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永远铭记自己“从哪里来”^[13]的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座谈会上讲,儒家、法家等“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14]

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如何培养人”问题的探索会发现,我们从延安时期注重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式,经过艰辛探索,逐渐转变为面向现代化的、强调理论性与专业性的教育方式。进入新时代,我们的青年教育方式在面向现代化、强调理论性与专业性的同时,更加强调了传统文化在青年培养中的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培养时代新人百年历程的现实启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国家,中华民族向来有总结和反思历史的传统。正有赖于此,中华民族才得以在厚植的历史中实现文明的延续。中国共产党培养时代新人的百年历程,深刻揭示了青年培育的内在规律,为我们今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要从党史的角度理解“时代新人”概念的历史穿透力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13个代表的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是当时的时代新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培养一批认同党的理想、践行党的使命的青年人,保障革命事业的代际延续,逐渐作为重要问题被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在为党的事业代际延续不断探索的历程中,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比如“又红又专”“四有青年”等等,但究其命题意识而言,都是在回答三个问题:“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即青年培养的政治标准、总体目标以及培养方式。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培养青年百年历程的基础上,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凝练总结提出“时代新人”概念,这是党对青年培养探索的继承,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经验的新发展。

(二)要牢固树立青年的理想信念,将政治标准作为培养时代新人的首要标准

纵观中国共产党探索“为谁培养人”的百年历程,始终把政治标准作为首要标准,这是总结历史得出的宝贵经验。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脱离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真正的革命青年需要党去培养。因此,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青年对党的忠诚等政治标准。毛泽东不仅强调青年要能吃苦,还特别强调青年要能“永远奋斗”。可以看出,政治标准的核心,就是要永远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立场。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标准的具体表述可能会变化,如革命战争年代青年的理想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则追求“艰苦创业”“建设祖国”,而改革开放时期又进一步演化为

“锐意创新”“振兴中华”“四有新人”等等,这是时代特征在政治标准上的具体体现。在新时代,坚持时代新人的政治标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如今数字经济、区块链等新生事物大量涌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面临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做解释,那么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就会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对青年思想造成冲击。因此,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加强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要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共党史的视角分析新社会现象,解答青年心中的疑惑,这样才能让理想信念在青年心中牢牢扎根。

(三)要正确认识青年发展规律,根据时代需求调整青年培养的思路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历程中,目标是与时俱进的,如“德智体美群”“五育”原则,“德智体美劳”和“教育现代化”目标等等。但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住了青年培育的一条脉络和主线,那就是处理好德才关系,即政治标准与才能标准之间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百年间中国共产党的育人目标,基本都是在围绕这两个关系展开,从政治标准优先,最终在新时代达成了德才并重、二者并举的新标准。对这一内在规律和脉络的准确把握,使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目标中不至于迷失,对“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基本问题始终保持清醒。

对于青年才能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认识过程。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懂军事、会写信等要求,发展到具备理论知识、专业水准,又发展到具备尖端领域研究水准等要求,每一个时代的才能标准都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时代需求展开。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尖端科技领域,也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青年才能的期望,一方面是要求培养青年的“工匠精神”,在尖端科技领域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又强调青年要找到文化的“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植青年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新期望,体现了对青年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培养问题上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四)要深刻把握当代青年的代际特征,保障党的事业的代际传承

自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了党的伟大事业以来,每一代青年都以不同方式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曾面临党的事业的代际传承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制度陷入混乱,许多青年在学龄阶段未能接受正规教育。恢复高考后,党的事业如何后继有人的问题依然严峻。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15]。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领导层干部年轻化”命题,以“50后”“60后”为主的大批青年人才经过实际工作的考验,逐步走上领导岗位,很快转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正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时代新人”。

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中国总人口仍在14亿人以上,但人口出生率则呈逐年下降趋势。此外,在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的思想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特征,对短视频等“快消品”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这种追求短刺激的传播方式,导致青年对于具有理论深度的话题容易出现疲劳,思考能力下降。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深刻、准确把握研究青年的思想特质,一方面要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知识传播节奏,用各种短视频等方式来吸引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和关注;另一方面,又绝不能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育“短平快”化,要引导青年静下心来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树立稳定扎实的理想信念。这是今天“时代新人”的独特特征,对这一特征的把握,有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传承。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对应的时代新人;党对时代新人的认识过程,也是探索“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历程。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新人观,具有坚持理想信念的一贯性,能够根据时代需要不断调整培养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15]

[参 考 文 献]

- [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 [3][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90页。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4、22页。
- [5]王松洲 林兆福:《湘鄂赣苏区文化史料》,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72页。
- [6]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 [7][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21页。
- [9]康 迪:《对乐天宇同志读〈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之商榷》,载《解放日报》,1942年9月25日。
- [10]乐天宇:《读〈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23日。
- [11]张应强:《新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艰难选择》,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
-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页。
- [1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 [1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责任编辑:韩永涛)